

冷战背景下苏联对外政治中的“敌人形象”*

张建华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关键词] 冷战;敌人形象;信息心理战;苏维埃爱国主义

[摘要] 在苏美冷战和东西方对抗时期,双方都实施了极具目的性的政治宣传,体现了双方极强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敌人形象”是苏美双方进行“文化冷战”、“文化外交”和“信息心理战”的重要手段。苏联共产党和政府运用了“敌人形象”的特殊影响,以全国政治总动员的方式对抗美国和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压力,并借以整合和唤起苏联公民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意识。“美国帝国主义”是苏联努力塑造的外部“敌人形象”的核心,并在塑造过程中带入了一些非理性的色彩。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10)07—0000—11

“Image of enemy”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ld War

ZHANG Jian-hu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100875, China)

Keywords: Cold War; Image of enemy;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war; Soviet patriotism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Cold War and West-East confrontation, both sides enforced political propaganda with strong purposes, which embodies political stands and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Image of enemy” i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cultural cold war”, “cultural diplomacy” and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warfare” used by U. S. and Soviet Unio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used the special influence of “image of enemy”, mobilized the whole country to fight against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essure from the U. S. and the West, by which integrated and evoked “Soviet patriotism” in soviet citizens. “American imperialism”, with some irrational and subjective conjecture, is the core of “image of enemy”.

在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过程中,苏联和美国极力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以证明自身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冷战的特殊性也赋予了冷战背景下苏联在对外政策中实施其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公民政治心理影响力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积极地运用“敌人形象”(образ врага)的特殊影响,整合和唤起苏联公民的“苏维埃爱国主义”(советский патриотизм)意识,以全民和全国政治动员(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агитация)的方式,对抗美国和西方强势的文化和政治压力,争取实现其“世界革命”使命。苏联时期的“敌人形象”基本上可以分为国外“敌人形象”和国内“敌人形象”两部分。本文集中论述苏联对外政治和外交政策中“敌人形象”的演变,兼及苏联国外“敌人形象”的历史文化因素及其政治影响力。^①

* 基金来源: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项目“苏联政治文化研究”(NCET-06-0136)。

① 汉语学界关于本专题的讨论尚未见,敬清华的《当代俄罗斯社会的敌人形象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李英男教授)仅在背景部分对苏联时期的“敌人形象”有所提及。苏联和俄罗斯学界研究成果较多,代表著作如苏联学者莫德尔任斯卡娅的《世界主义——帝国主义奴役其他民族的意识形态》[(Модрягинская Е. Д.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порабощения наций),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莫德尔任斯卡娅与他人合著《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Модрягинская Е. Д. и др. Идеолог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ионизма,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当代俄罗斯学者法切耶夫的《1945~1954年苏联宣传中的敌人形象》[(Фатеев А. В. Образ враг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1945~1954 гг.), 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出版社1999年版]、当代俄罗斯学者利西奇多等著《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Лисицкий В. А. и др., Третья миров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 —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война), 莫斯科:俄罗斯社会政治研究所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中文版由徐昌翰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欧美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仅见芬兰学者索

— “敌人形象”的政治功能和 苏联国外“敌人形象”的起源

根据瑞士精神分析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心理学理论,国家政治和公民心理层面的“敌人形象”(Image of enemy/Образ врага)是人类思维中“自己”(Oneself/Сам)与“异己”(Dissident/Чужой)的对立模式的体现,是典型的集体无意识表现。当代俄罗斯文学家斯捷潘诺夫(Ю. С. Степанов)也认为:“‘自己’与‘异己’的对立模式以各种方式贯穿于整个文化之中。它是集体、大众和民族的世界观的一个主要观念。”^①当代俄罗斯文化学家列文松(А. Левинсон)同样认为:“敌人是让人憎恨的一个客体,一个引起人们强烈反感的对象。敌人形象不仅是一个表达人们仇视心理的概念,而且是一个能调动主体负面情绪,并借此团结自身力量的概念。”^②

政治学意义中的“敌人形象”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心理的定式,在缺乏有关政治对手以及周围环境的确凿信息的情况下,可能以此为据采取的某种政治行为”^③。社会学意义中的“敌人形象”则是国家危机或社会危机背景下整合民族士气,进入全民政治动员的工具。

敌人形象经常被应用于政治斗争之中,它是政党或国家实施政治动员的一个特殊资源。在政治生活中,敌人成为当权者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巩固政权机制,规避政治危机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手段。借描绘敌人形象和敌对团体的“丑”与“恶”而彰显本民族群体、本团体领袖的“美”与“善”,甚至可以利用敌人形象来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良现象,可以把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推卸到现实或虚拟的敌人身上,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文化,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动员。俄罗斯学者波切普佐夫(Г. Г. Почепцов)认为:“把象征性的敌人形象用于负面宣传,这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惯用手段。”^④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红色国家诞生于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国内和国外环境之中,承担着长时期的和全方位的政治和外交压力。因此,主要来自于国外的“敌人形象”在早期苏维埃政权建立、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加速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党内政治斗争和大清洗、卫国战争期间、1950~1980年代的苏美冷战等历史时期是现实存在的,同时也是苏联共产党和

苏联政府对苏联人民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资源。

“敌人形象”在苏联对外政治和政治文化中长盛不衰,一方面源自苏维埃政权自初就始终处于西方国家和法西斯势力敌对的环境之中,另一方面源自苏联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对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判断。斯大林强调:“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在重新部署力量,其目的在于保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我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⑤毫无疑问,斯大林的判断影响了他的决

尼卡·文森的《形象研究和敌人形象:芬兰冬季战争中的苏联(1939年9月30日至1940年4月13日)》[(Sinikka Wunsch, *Image Research and the Enemy Image: The Soviet Union in Finnish Newspapers during the Winter War (November 30, 1939—March 13, 1940)*, <http://herkules.oulu.fi/isbn9514266331/html/t857.html>, (发布时间不详)/2009—12—30]。美国学者西蒙科的《形象和军备控制:里根时期的苏联印象》[(Keith L. Shimko, *Images and Arms Control: Percep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密执安: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另外,美国外交史名家拉菲博在1980年再版的《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80*), 纽约:麦格罗·希尔国际出版社1980年版]中对此问题有所提及。

- ① 斯捷潘诺夫:《恒量:俄罗斯文化辞典》(Степанов Ю. С. Константы.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莫斯科:科学规划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本文主要使用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发表的档案文献,借鉴俄罗斯(苏联)学术界最新相关的专题著作,采用了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关注苏联政治文化结构中的“敌人形象”。
- ② 列文松:《脚下的高加索:“敌人形象”在高加索民族关系中形成和实际应用简论》(Левинсон А. Кавказ подмною. Краткие заметки п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му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ю “образа враг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лиц кавказ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http://demoscope.ru/weekly/2003/0133/analit03.php>, [发布时间不详]2009—12—29。
- ③ 阿维里亚诺夫主编:《文化学:百科辞典》(Аверьянов Ю. И. Политолог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莫斯科:莫斯科商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 ④ 波切普佐夫:《入侵》(Почепцов Г. Г. Имиджология), 莫斯科:列弗尔—布克出版社2001年版,第463页。
- ⑤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15~16、25~26页。

策,也影响了后来的苏联政治。

卫国战争爆发后,联共(布)中央就通过了组织宣传和反宣传的决议。1941年6月24日苏联情报局(Совинформбюро)组织编写印刷品制作和有关国际事件、国内生活和前线军事行动广播的说明,“建立应对德国和其他敌对反宣传的反宣传机构”,该事务负责人是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托夫(А. С. Щербаков),副手是罗佐夫斯基(С. А. Лозовский)。6月25日建立了苏联军事政治宣传局长,局长是缅赫里斯(Л. З. Мехлис)、副局长是穆努里斯基(Д. З. Мануильский)。该机构的任务是在敌国的居民和军人中进行政治宣传。在苏联情报局中建立了文学小组,吸收著名作家和出版家维尔塔(Н. Н. Вирта)、波列伏依(Б. Н. Полевой)、西蒙诺夫(КМ. Симонов)、吉洪诺夫(Н. А. Тихонов)、托尔斯泰(А. Н. Толстой)、法捷耶夫(А. А. Фадеев)、费定(КА. Федин)、列昂诺夫(Л. Леонов)、肖洛霍夫(М. А. Шолохов)、爱伦堡(И. Г. Эренбург)参加,其中还有德国反法西斯人士勃伦杰尔(В. Бредель)和沃里夫(Ф. Вольф)。通晓欧洲多种语言的爱伦堡、列昂诺夫、西蒙诺夫、费定等作家的作品和文章在国外很有影响。作家维什涅夫斯基(В. Вишневский)强调:“所有的文学是国防的。”^①苏联情报局对作家们提出了要求:“个别的事实和概括应该反映我国军队的军事特点,反映前线和后方团结一致……尽管有着巨大的困难、巨大的牺牲、我们在不可动摇的道德的统一的的前提下勇往直前。这意味着真实地反映,苏联就在于苏联的力量。”^②爱伦堡认为,战争时期爱国作家的使命就是,“应该注视摆在自己面前的希特勒分子的面貌:这是应该准确无误射击的靶子,这是我们厌恶的化身。我们的责任就是燃起对于恶的憎恨和巩固我们美好的、善良的和正义的东西”^③。

爱伦堡认为,“法西斯”(фашист)术语本身就接近于“非人类”(нелюди)或是资本主义的黑暗力量、非人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德国法西斯意识形态培育出来的人类逆种。法西斯就是冰冷的“自动步枪”、“专业杀人犯”、“占领者”、“施暴者”和“匪徒”的代名词。第三帝国的元首则是和平生活中“无可救药的失败者”、“性错乱者”、“杀人犯”和“当代的奴隶主”的代名词。^④

苏联政府在对外宣传中如此丑化德国法西斯的同盟者,“在顿巴斯意大利人投降成了俘虏,这不是由于苏军的传单所为,而是他们远远地闻到苏军行军厨房和香味就疯了,于是饥饿的蛔虫开始理解,什么东西能让他们舒服了。匈牙利人在喋喋不休地抱怨。生满虱子的罗马尼亚人使劲地在搔痒。斯洛伐克人在低声埋怨。在奴才的下房里因丑闻而吵架”(爱伦堡语)。^⑤

在卫国战争初期,巴甫连科(П. Павленко)和克雷洛夫(П. Крылова)创作了《加斯杰罗大尉》(Капитан Гастелло)、爱伦堡创作了《考验》(Испытание)、列昂诺夫创作了《你的兄弟瓦洛佳·库里连科》(Твой брат Володя Куриленко)、肖洛霍夫创作了《仇恨的科学》(Наука ненависти)、多夫仁科(А. Довженко)创作了《胸前一百次暴风》(Сто ураганов в груди)。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А. А. Ахматова)曾被苏联政府视为“垂死世界”的情绪的代言人,长期受到压制和打击,自1930年代后,几乎从未公开发表诗作。在卫国战争期间,她也参加了“苏维埃爱国主义”宣传活动,创作诗篇《起誓》(Клятва, 1941)、《勇敢》(Мужество, 1942)和《胜利》(Победа, 1942~1945)。阿赫玛托娃在自传中谈到这个特殊时期她的感受:“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

① 克拉西拉什科等编辑:《来自苏联情报局:1941~1945年战争年代的政论著作和特写》(Красильщик С. и др., 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информбюро... 1941~1945.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и очерки военных лет)第2卷,莫斯科:阿帕恩出版社1984年版,第460页。

② 克拉西拉什科等编辑:《来自苏联情报局:1941~1945年战争年代的政论著作和特写》第2卷,第470页。

③ 爱伦堡:《艺术的职责》,载《文学和艺术》(Эренбург И. Долг искусства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莫斯科:《文学和艺术》报社,1943年7月3日。

④ 爱伦堡:《时间临近!》(Эренбург И. Близится час!),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2年版,第28、36、44页;克拉西拉什科等编辑:《来自苏联情报局:1941~1945年战争年代的政论著作和特写》(Красильщик С. и др., 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информбюро... 1941—1945.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и очерки военных лет)第1卷,莫斯科:阿帕恩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页;克拉西拉什科等编辑:《来自苏联情报局:1941~1945年战争年代的政论著作和特写》第2卷,第410页。

⑤ 爱伦堡:《时间临近!》,第50页。

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阴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① 这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宣传卫国战争是人民的和正义的战争,宣传苏联人的力量和勇敢,强调德国法西斯及其同盟者是人类的罪人。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最成功的心理战案例是大量向德国军人中投放传单:画面上一片皑皑白雪,几具被冻僵的德军士兵的尸体狼藉卧地,背景是一个德国儿童在哭泣,画面上只印了三个德文单词:Fater ist tod(爸爸被打死了)。这张传单极具震撼力,许多德国军人把这张传单当成向苏军投降的护身符和通行证。

苏联作家在宣传苏联的战时盟友——美国时调动了一切美好之词,向苏联公民展现了爱好和平、热爱生活甚至是行侠仗义的美人形象。西蒙诺夫(К. Симонов)创作的《美国人》(Американцы)中表现了美国人是快乐的伙伴、纪念品收集爱好者、与苏联人一样品质的真正战士。波列伏依在1942年7月告诉投敌分子,“俄罗斯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高山,谁想以身试法,他就是不知死活。”^②

二战期间苏美战时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俄文版《美国画报》(Америка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ый журнал)在苏联的公开发行。1943年10月莫斯科会议结束后,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向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提出请求,允许美国在苏联发行反映美国战时活动和美国生活的《美国画报》。1945年10月,由美国“战时新闻处”(OWD)编辑出版的《美国画报》的前两期开始通过订购和零售方式在苏联发行。《美国画报》向苏联公众介绍美国国家人民的生活、工作和休闲情况。杂志的目标是通过传播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价值观来消解苏联公众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促进苏联人民对个人自由、物质文明的向往以削弱共产主义政权。正如当时杂志的主编桑德斯(R. Sanders)所说,“我们的杂志从不自吹自擂或是企图挑起不公平的对比,它不是一个攻击苏联的前线,它只是一场持久运动(campaign),其目的就是在苏联读者心目中投上哪怕一点的、对共产主义优越性怀疑的阴影”^③。为了了解苏联公众喜欢的话题,《美国画报》的工作人员研究苏联报纸和杂志,积极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收集信息,并通过

国务院驻苏联的工作人员了解读者的意见。调查结果表明,苏联读者喜欢关于美国科学、戏剧以及工业发展等方面的文章,喜欢那些介绍美国人生活的文章和图片,其中,介绍美国著名女影星狄安娜·都萍(Deanna Durbin)生活的文章深受苏联读者欢迎。苏联妇女还将那些介绍美国妇女衣着图片作为自己穿衣打扮的参考。

二 冷战背景下苏联“敌人形象”的塑造

“如果说1945年至1947年上半年,苏联和美国事实上是盟友的话,那么从这一年下半年开始,他们的关系已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敌人,于是两者开始了心理战,树立对方敌人形象是一个重要的手段。”^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之而来的是苏美关系由战时盟友剧变为冷战对手,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直至1980年代末,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和它们的盟友之间开始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

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法切耶夫(А. В. Фатеев)认为:“‘敌人形象’是作为意识形态象征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反面,它的政治观点暗指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对国家和它的领导人无条件的忠诚,它的经济观点暗指在平均分配和居民最低需求的条件下的高效劳动。按照苏联领导人的观点,‘有生命力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应该是公民政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苏联对外政治和政策中的“敌人形象”既是迫于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压力而为的对策,同时也是主动实施外交和政治影响的战略。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该文件宣布:“为了目前已经开始的政治战,政府不得不于当前和平时期就拟定针对俄国的更为明确、更具进攻性的目标……我国对俄的

① 阿赫玛托娃:《文集》(Ахматова А. Собр. соч)第3卷,莫斯科:埃里斯—拉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② 克拉西拉什科等编辑:《来自苏联情报局:1941~1945年战争年代的政论著作和特写》第1卷,第191页。

③ 《美国之音》(The Voice of America),载《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纽约:《时代》杂志社,1949年1月6日。

④ 法切耶夫:《1945~1954年苏联宣传中的敌人形象》,第5~6页。

⑤ 法切耶夫:《1945~1954年苏联宣传中的敌人形象》,第9~10页。

基本目标实际上可归结为两点：A)使莫斯科的实力和影响降到最低水平。B)彻底改变俄国当权政府奉行的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和平年代我们的目的不是推翻苏联政府。当然，我们要努力制造一些苏联领导人不能容忍和不喜欢的情况和局势。在这种局势中他们很可能就无法维持在俄罗斯的政权……如果在和平年代真的出现了我们为之力努力的、而为维持苏联内部统治体制来说又是不可容忍的那种局面，致使苏联政府下台的话，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遗憾、承担责任，或认为这是我们的功劳。”^①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开始策划心理战行动，并将写入美国陆军条例的第33款第5条中，即“调动并利用所有手段，包括精神和肉体上的手段（正规军的军事行动除外，但亦可利用它们造成心理效应），借助它们消除敌人的求胜意志、破坏可使敌人获胜的政治及经济潜力；使敌人丧失来自盟友和中立派的支持、援助及同情，或防止敌人获取这种支持和同情；使我国人民及盟友确立、保持并增强获胜的信念；寻求、保持并扩大支持、援助，以及来自中立派的同情”^②，从而“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作战的目的在于按一定方向改变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社会意识对周围世界形成虚假的认识，以利于进一步操纵控制该国居民及其管理精英。”^③

1946年3月5日，下野的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L. S. Churchill）在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陪同下，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Iron Curtain）。在丘吉尔的演说发表8天后，斯大林在1946年3月13日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讲话：“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而且丘吉尔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应当指出，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在这方面非常像希特勒及其伙伴。”^④

1946年6月，苏联记者伊扎科夫（Б. Изаков）和马里尼（哈文松）（М. Маринин / Я. С. Хавинсон）分别著文《比基尼岛》（Бикини）和《原子弹外交和它的手段》（Атом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и ее маневры）直接批评美国的“原子弹外交”是政治讹诈，强调美国政府是想搞原子弹垄断。^⑤

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Е. С. Варга）院士于1946年11月27日在《真理报》（Правда）发表文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析来临》（Приближ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мире），宣布美国正处在经济危机的前夜，它的“破坏作用”不能给欧洲国家带来“经济繁荣的地带”。

苏联作家继续扮演苏联政治的宣传者角色。1946年11月，作家爱伦堡到美国访问，他在与美国前商业部长威尔斯（G. Welles）的对话中谈及在美国政府中反苏情绪的增长，对美国政府压制按照已故罗斯福总统的政策与苏联友好相处的人士的事件表示关注，表示对美国在欧洲的政策不理解。爱伦堡说：“不可信的信息快速增加，这就是宣传。”^⑥

1947年5月，斯大林还以尊重的态度评论美国人的选举制度，然而到了9月，斯大林就宣布美国和英国是苏联的头号敌人。1947年9月18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А. Я. Вышинский）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为了和平和各国人民友谊，反对新战争贩子》（За мир и дружбу народов, против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новой войны），他指责美国和英国必须停止使用原子弹武器，他强调杜鲁门政府“准备新的战争，已脱离干巴巴的宣传、心理战和精神战游戏阶段。大量的事实说明，在一些国家里，特别是美国，军事变态狂正准备把实际的军事战备性质的措施变成现实”^⑦。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利用这些国际问题来进行反美宣传与意识形态批判工作。宣传

① 利西奇多等著，徐昌翰等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8~69页。
② 利西奇多等著，徐昌翰等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第67页。
③ 利西奇多等著，徐昌翰等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第1页。
④ 《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3~464页。
⑤ 《真理报》（Правда），莫斯科：《真理报》社，1946年7月3日、7月14日、8月26日、9月3日、9月8日、10月7日。
⑥ 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全宗631，特藏14，卷宗56，件3、14、15、17、17об（РГАЛИ. Ф. 631. Он. 14. Л. 56. Л. 3, 14, 15, 17, 17 об.）
⑦ 《真理报》（Правда），莫斯科：《真理报》社，1947年9月19日。

鼓动部给斯大林、日丹诺夫(А. А. Жданов)、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ов)和苏斯洛夫(М. А. Суслов)等人诸多提案,建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系列斩断“有害的”对外交往的决议。例如,1946年10月13日宣传鼓动部上呈了斯大林关于《英国盟友》(Британский союзник)周报的报告。该周报是1942年开始由英国驻苏大使馆用俄语出版的,发行量约为50000份的报纸。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В. С. Абакумов)通报,该份周报在部分苏联读者中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文化与生活》(Культура и жизнь)报编辑部就收到读者来信,揭露这份周报上刊登了大量有害的政治内容。^①显然这份由英国大使馆主办的《英国盟友》周报所刊载的内容,与此时以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为目标的意识形态批判方向是相抵触的。该报被联共(布)中央立即定位成政治上有害的外国报纸,原来订阅的苏联公民纷纷退订,造成了其发行量和影响力急剧萎缩。1949年12月27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改变了《英国盟友》等国外发行的报刊的出版条款,规定将不会支付1950年1月1日之前未售出的报刊的价款,并将这些报刊退回给出版社。^②

苏联境内的反美宣传也是中央宣传鼓动机关工作的重要课题之一。苏美逐渐走向冷战对抗后,在国内外进行反美宣传的重要程度逐渐增加,尤其是在国际局势紧张之时,反美浪潮就更加高涨。宣传鼓动局非常善于利用对苏联有利的外力来进行反美宣传,以增加可信度和真实性。1947年4月18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出台了在苏联公民中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的计划。这份秘密文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利用一切宣传方式与手段,开动各级宣传机关,在苏联人民中宣传爱国主义,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没落。^③1948年1月24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呈报联共(布)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报告说,据苏联情报局获得的消息,美国人斯基尔(И. Стил)的《美元黑幕》(Долларовый занавес)一书未获准在苏联出版,该书的内容是揭露并批判美国统治集团的政策,若出版对苏联而言是非常有好处的。中央宣传鼓动部给出的意见是,先由法国或者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步出版社出版该书,再翻译成俄文更好一些。^④这本《美元黑幕》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

是单从这个极富煽动性的名称,可以略微明白它的内容大致是吻合反美宣传方向的,是有助于揭露美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

苏联的反美宣传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持续运动。1949年3月1日,宣传鼓动部出台了在近期内加强反美宣传的措施计划,计划组织一系列报刊杂志系统地进行反美宣传。3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颁布了决议,准许外语书籍出版社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出版《美国外交官的真相》(Правда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ах)一书。这本揭露美国人在苏联实行间谍行为和搞反苏阴谋的书的作者安娜别尔娜·比卡尔(Аннабелла Бюкар)身份颇为值得玩味,她是“一个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情报部门工作的,有着斯拉夫血统的年轻女人,因为爱上了莫斯科滑稽歌舞剧院的男高音演员而决定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⑤《美国外交官的真相》还被改编为电影,用于反美宣传。

- ① 《中央宣传鼓动部1946年10月13日致斯大林关于〈英国周报〉问题》,《斯大林和世界主义》档案第29号(Проект докладной записки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И. В. Сталину по вопросу о еженедельнике “Британский союзник”, 13.10.1946//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умент №. 29.)
- ② 《1949年12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英国周报〉〈英国纪事〉〈美国〉杂志在苏联出版条件的决议》,《斯大林和世界主义》档案第218号(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б условиях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в СССР изданий “Британский союзник”, “Британ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и “Америка”, 27.12.1949//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умент №. 218.)
- ③ 《1947年4月18日关于在居民中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思想的措施计划》,《中央宣传鼓动部》档案第38号(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пропаганде среди населения идей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атриотизма. Документ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18.04.1947//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умент №. 38.)
- ④ 《1948年1月24日中央宣传鼓动部给苏斯洛夫的关于出版美国广播评论家斯基尔著作的报告》,《斯大林和世界主义》档案第55号(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 А. Суслову по вопросу издания в СССР книг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радиокomentатора И. Стила, 24.01.1948//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умент №. 55.)
- ⑤ 《1949年3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出版外文著作〈美国外交官的真相〉的决议》,《斯大林和世界主义》档案第120号(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 выпуске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книги “правда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ах”, 11.03.1949//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умент №. 120.)

1949年4月苏联政府制定《近期反美宣传强化措施计划》(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усилени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на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它指示宣传者把注意用在损害美国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威信之上。具体包括:努力宣传美国经济大危机的各种征兆,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美国扶植法西斯主义,美国文化和道德的堕落与腐朽,美国日益严重的种族主义,美国新闻出版业的厚颜无耻,美国社会犯罪率急速上升,美国政府中存在着危险的反苏阴谋者,美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性并为达到这一目的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НАТО),以及作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思想进攻武器的“世界主义”,并且特别强调在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等等。

在中央宣传鼓动部的指挥下,苏联作家协会、艺术事务委员会与苏联电影事业部等文艺部门与各种学术机构,也都拟定了相应计划,力求创作各种题材的反美反帝题材优秀作品。1949年3月19日,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西蒙诺夫上呈马林科夫报告说,他准备创作戏剧《高尔基在美国》(Горький в Америке),借此达到抨击资本主义美国报刊媒体的腐败与伪善,揭露美国的世界主义与世界主义者真面目的。4月1日,作家协会通过了加强反美宣传措施的决议,决定用戏剧、电影剧本和小说等形式来揭露美国的反动生活并结集出版,还详细规定了一系列创作题材与内容。4月20日,在中央宣传鼓动部上呈苏斯洛夫报告中,对什帕诺夫(Н. Н. Шпанов)的小说《战争贩子》(《Поджигатели》)一书的出版工作给予了特殊的关注,责成负责该书出版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近期内完成该项工作,原因就是该小说的创作目的就是为揭露美英等国及其间谍机关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预谋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5月11日,艺术事务委员会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也召开会议并采取了相应措施,详细规定要创作的一系列反美反帝题材的戏剧作品,并在全国范围内演出。^①在这一时期,还出版了《美国的劳动与资本家》(Труд и капитал в США)、《这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法西斯地缘政治学》(Фашистск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на служб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发疯的绅士》(Бесноватый галантерейщик)等反美反帝题材的作品。

1953年1月8日,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报《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在讨论第一个季度编辑计划时,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该报总编西蒙诺夫(К. М. Симонов)告诉同事们:“我特别请求大家考虑这些题目:美国佬的傲慢、侮辱其他国家、嘲弄其他民族的道德和风俗习惯,嘲弄民族独立和主权意识”“这就特别需要进行宣传,如果美国人呆在他们自己的家里,这或许没有问题,而当他们到处游走,到处喷粪,到处激怒其他国家的人,那么就应该收拾他了。”^②他强调有经验的宣传是抓住敌人的行为特点,即引发任何人反感的“傲慢”“侮辱”行为。这一点由苏共中央在所有宣传者中推广,苏联报纸立即增加了关于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报道,如西方的情报机构在保加利亚、波兰的无耻活动,美国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种族主义歧视、美国青年的堕落和颓废等等。法国人皮埃尔·戴克斯(Pierre Dexts)第一次在苏联《文学报》(1953年2月10日)上借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剧本《赢得尊敬的畜生》(Тварь, заслуживающая почтения)中的语言,“在美国暴力方式、私刑和政治清洗成为可怕的统治者”批判美国。并宣布1953年2月初选举产生的美国新政府以及实际上是由乌尔·斯特林(Уолл-стрит)安插的部长们都是罪人并且与原德国法西斯体制有着脱不掉的干系。^③

1953年斯大林去后,苏联政府美国和西方采取了较灵活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认识到苏联的和平攻势是美国文化渗透的绝佳机会,美苏文化交流活动可以打破苏联政府对人民的信息垄断,成为赢得人心,激起铁幕背后不满的重要工具。美国政府开始放宽对东西方交流上的限制,并于1956年6月29日,艾森豪威尔(Dwight

① 《1949年5月11日列别杰夫给莫洛托夫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委员会进行反美宣传的说明》,《斯大林和世界主义》档案第156号(Записка П. И. Лебедева Г. М. Маленкову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учреждениями комитета по делам искусств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1.05.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умент №.156)。

② 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全宗634,特藏4,卷宗407,件6,8(РГАЛИ. Ф. 634. Оп. 4. Д. 407. Л. 6, 8)。

③ 《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莫斯科:《文学报》社,1953年2月10日。

David Eisenhower) 总统批准名为《东西方交流政策声明》的 NSC5607 号文件, 该文件要求把东西方文化交流计划当作“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设性工具”, 提出要通过“促进苏联卫星国人民对更大的个人自由、福利和安全的向往来削弱共产党政权”。NSC5607 号文件的实施推动了美苏间的文化交流。1956 年 10 月 9 日, 苏美进行谈判并达成一份交换期刊的协议, 即双方同意美国每年继续在苏联发行 5000 册俄文版的《美国画报》, 苏联在美国发行同样数量的英语版的《苏联》(USSR。后来改为《苏维埃生活》[Soviet Life])。

1958 年 1 月 28 日, 美苏双方正式签订《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定》(《美苏文化交流协定》)。由于谈判的主要代表分别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东西方交流特别助理威廉·莱西(William S. B. Lacy)和苏联驻美国大使乔治·扎鲁宾(Georgi Zarubin, Георгий Зарубин), 因此这份协定也被称为《莱西—扎鲁宾协定》(Lacy—Zarubin Agreement)。根据该协定, 双方同意在科技、农业、医疗与公共健康、广播电视、动画、展览、出版、政府、青年、体育、学术研究、文化以及旅游等领域进行交流。^① 这个协定打开了冷战时期苏美文化领域的大门, 为苏美合法和定期地通过自己的思想、符号和文化向对方国家渗透提供了条件。从此, 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获得了比较正常、固定的渠道, 苏美之间竞争的内容逐渐变成了互相展示各自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经济组织、意识形态基础、文化和艺术成就、科技发展以及种族、阶级关系的优势。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美苏双方有了一定数目的人员互访, 使双方的交流频率比先前大为增加。从 1958 年 6 月开始至 1959 年 9 月, 美苏之间出现了两国历史上少见的人员互访, 特别是高层官员之间的互访。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柯兹洛夫(Ф. Р. Козлов)于 1959 年 6 月 28 至 7 月 13 日访问美国、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与 1959 年 7 月 23 日到 8 月 2 日访问苏联以及赫鲁晓夫于 1959 年 9 月 15 日到 27 日访问美国。

自十月革命之后,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的 1959 年访苏活动是美国最高级别政府官员对苏联的访问。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主持在莫斯

科萨果勒尼科公园的美国展览会开幕式, 除此之外, 对尼克松来说, 更重要的是他想“利用这一罕见的机会越过苏联当局直接会见苏联人民”^②。

尼克松一行人抵达莫斯科后, 先参加了住地附近的丹尼洛夫斯基市场。市场上购物的苏联人见到美国副总统, 大为惊奇并且立即热情地围拢上来。有几个苏联人问尼克松是否有展览会的入场券。原来展览会入场券是由苏联政府按计划分发的, 而且每张入场券 1 卢布约合美金两角五分。尼克松向他们解释说他没有随身携带入场券, 他的随行人员杰克·舍伍德(Jack Sherwood)把一张百元卢布纸币递给这位想要获得入场券的苏联人, 但是苏联人予以拒绝, 解释说他们所以不能参加展览会并不是没有钱买票, 而是因为买不到票。

尼克松真切地感受到苏联人民是友好的, 然而在第二天, 随员把苏联官方报纸的报道翻译给他听时, 他却大吃一惊。《真理报》(Правда)、《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劳动报》(Труд)这三家最大的官方报纸, 一齐指责尼克松试图“贿赂”和“腐蚀”一个苏联公民。一篇报道说尼克松施展资本主义诡计, 递钱给一个“苏联公民”^③。尼克松称这一事件给他上了一课, 认为苏联官方媒体的报道简直就是毫无根据的, 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宣传工具。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认为, 在他去的所有地方仿佛都安插了提问者, 向他提出一些明显经过预演的政治性问题。在他参观水电站工程、工厂或矿山时, 都出现了这一熟悉的套路。有的人会从人群中走出来, 自称是工人或是普通的苏联公民, 几乎是机械地背诵一个一个问题。例如, 为什么美国想要发动战争? 为什么美国利用在外国的军事基地来威胁苏联?^④

驻苏联记者团团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对尼克松在苏联的遭遇发表自

① 雷蒙德·《美苏文化交流(1958~1986)》(Yale Richmond, U. S. — 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 1958 ~ 1986), 布尔登, 西方观点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2、9 页。
② 雷蒙德·加特霍夫著, 伍牛等译:《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 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79 页。
③ 尼克松著, 黄兴等译:《六次危机》,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46~348 页。
④ 尼克松著, 黄兴等译:《六次危机》, 第 384 页。

己的看法。他说：“尼克松副总统今天对几个提问者宣讲了言论自由的价值……这在苏联生活中是一次罕有的经历——一位领导者和从人群中出现的挑战者自由轻松地交谈。从向尼克松先生所提问题的相似性和提问者的策略可以看出，他们是出自一个鼓动中心。报纸上出现了几次刺激性报道，它表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鼓动宣传部队尼克松先生接近群众的方式所造成的影响，越来越感到紧张不安……”^①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称，在他们进入的每座建筑物外面的大街上都聚集了数千人，出来时人们就向他们欢呼致意。但是，苏联政府试图阻止群众对美国客人的热情，一个粗壮的警察粗暴地抓住一位妇女的肩膀，不让她鼓掌欢迎。^②

1956年10月，根据美国新闻署与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苏美开始互惠发行杂志——苏联在美国发行英文杂志《苏维埃生活》，美国在苏联发行俄文杂志《美国画报》。苏美两国利用这两份杂志，展开了相互的文化攻势。

作为一份政治性极强的杂志，《苏维埃生活》必须体现苏联共产党^③的意识形态，必须充分反映苏维埃文化。因此，这份杂志主要转载《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等其它报刊。杂志往往在重大事件发生几个月后才进行集中报道，时效性不强，但重视报道的深度和宣传效果。杂志配有大量插图，无论是纸张还是印刷质量都明显好于苏联其他国内报刊。《苏维埃生活》的主要栏目有：苏维埃人民、国际关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休闲体育、杂俎栏等；有时遇到十月革命、列宁诞辰的周年纪念，会增加“俄国革命”（Russian Revolution）、“列宁”（V. I. Lenin）等专栏；1980年代后期，增加了苏美关系、改革与公开性专栏等。1985年增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Our Life Style）专栏，介绍普通苏联人民的生活。杂志的每一期都会刊登美国读者的来信，有的发表对杂志的评价，有的提出关于苏联的问题。读者对苏联的一切：从地理到历史，从普通人民生活到国家政治体制，从动物保护到公民权利都感兴趣，杂志在“问题和回答”（Question And Answer）一栏中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但一些被苏联政府认为与苏联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社会问题，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问题、苏联的人权问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很少提及。

从1956年10月开始发行到1991年12月

停刊，《苏维埃生活》共发行423期。苏联政府将读者确定为左翼人士，但实际上杂志的读者多为对科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感兴趣的人，很多大中学校图书馆也订阅这份杂志。

《苏维埃生活》杂志充满了“敌人意识”，它除了宣扬意识形态斗争之外，还展示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自信心，反复向美国宣传“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苏联必将战胜美国”。杂志一再引用美国人关于苏美意识形态斗争的观点，向美国人民展示美国政治家是如何看待苏美关系。

1963年第4期的《苏维埃生活》刊登《苏美经济竞赛》（Economic Competition Between Soviet And USA），文中提到1960年美国民主党领导人在竞选中说：“我们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没有结果、没有依据的，在不久的将来注定会失败。”这篇文章予以回应：“……不去辩论这个问题（苏美意识形态孰优孰劣），让历史去判断”，但它还是逐步地对“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苏联必将战胜美国”进行论证。^④而对于将美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的原因，该文的解释是：第一，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只有超过资本主义才能证明自己的优越性；第二，美苏人口、领土差不多；第三，都有较发达的工业、科技和文化。^⑤

从1964年12月到1976年2月，《苏维埃生活》设立“关于共产主义问题”（Questions On Communism），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优越性，宣传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为反击美国对于苏联“排犹主义”的宣传，1965年4月封面刊登了苏联犹太人家庭过宗教节日的照片，也有《犹太人的真实生活》（The Real Life Of The Jews）这样的文章，反复强调“犹太人和其它民族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杂志有很多带有象征性的内容，例如，1986年第7期的封面是一个苏

① 尼克松著，黄兴等译：《六次危机》，第385页。

② 尼克松著，黄兴等译：《六次危机》，第387页。

③ 1952年10月，在联共（布）第19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取消双重名称，改称苏联共产党，即“苏共”。

④ 《苏美经济竞赛》（Economic Competition Between Soviet And USA），载《苏维埃生活》（Soviet Life）1964年第4期，莫斯科：《苏维埃生活》杂志社，1963年4月出版，第20页。

⑤ 《苏美经济竞赛》，载《苏维埃生活》1963年第4期，第20页。

联小女孩在公园放风筝,风筝由苏美两国国旗组成,象征两国的“和平共处”,以配合苏联的和平宣传攻势。

1965年第2期《苏维埃生活》,在“问题和回答”栏目,以回答一位来自美国新泽西的读者问题的方式,对“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苏联必将战胜美国”进行了论证。这位读者在来信中谈到在《苏维埃生活》杂志1964年第6期上,格奥尔基·弗拉索夫(George Frantsov/Георгий Власов)的文章强调生产对一个社会来说是最关键的因素,那么,按照弗拉索夫的说法,美国就应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美国的生产能力比世界任何国家都要强。

《苏维埃生活》杂志在回答这位新泽西读者的来信中,对弗拉索夫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强调苏联最终将赶超美国,社会主义最终将战胜资本主义:

弗拉索夫的文章讲的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胜利,他还引用了列宁阐述的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列宁说: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新的社会体系最终胜利的关键因素。资本主义能够,而且最终必将被打败。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更高效的生产体系。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长期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这是最重要的。封建社会取代奴隶制社会因为它的劳动生产率更高;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也是同样的道理。尽管这个过程开始时,一些旧封建国家的生产力比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强大。弗拉索夫要说的,虽然美国今天的生产力水平比苏联高,但是就生产率而论,社会主义经济是更进步的,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差距会消失,但最终差距又会拉开,而那时占优势的将是苏联。^①

在维达里·维果茨基(Vitali Vygodsky/Виталь Вьготский)所写的《〈资本论〉是怎样写成的?》(How“Capital”Was Writte)(《苏维埃生活》1968年第12期)一文中,作者记述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历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并评价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这篇文章对《资本论》的主要观点进行介绍,最引人注目的是文中的4幅插图。

第一幅图是一对贫穷的母子,因饥饿而奄奄一息。图解: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马克思引用了19世纪苏格兰女公爵进行的

圈地。从1812年到1820年,她将15000名农民驱逐出土地,致使他们无家可归,最终只能沦为雇佣工人。

第二幅图是一群工人正在做苦力。图解: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价值的来源是什么?答案是:工人的劳动。

第三幅图是:在一个表盘上,一只手正抓着指针。图解:资本主义生活中的工人劳动时间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决定的。

第四幅图是一个工人,他前面是一片高楼大厦,在大楼烟囱上插着一面苏联国旗,象征着工人阶级是苏联的主人,图解:被剥削了劳动力的工人通过革命的方式进行斗争,反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束了社会不公正和民族压迫,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社会。^②

三 结语:“心理战”、“文化冷战”与“敌人形象”

“敌人形象”是社会对抗的意识形态反映、敌对国家和公民力量的鲜活象征、社会统治集团的政治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强化了自1920年代形成的“苏联敌人形象”。苏联政府也积极地推动形成“美国和西方敌人形象”。

从历时态来看,苏联的“敌人形象”植根于俄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发源于19世纪初的“共济会阴谋论”^③和19世纪末的“犹太人反俄罗斯阴

① 《问题和答复》(Question And Answer),载《苏维埃生活》(Soviet Life)1965年第2期,莫斯科:《苏维埃生活》杂志社,1965年4月出版,第39页。

② 《〈资本论〉是怎样写成的?》(How“Capital”Was Writte?),载《苏维埃生活》(Soviet Life)1968年第12期,莫斯科:《苏维埃生活》杂志社,1968年12月出版,第14~15页。

③ 共济会(Freemasonry/масонство)起源于英国,最初是石匠秘密的同业行会,后传播到欧洲各国。自18世纪初传入俄国以后,直至十月革命前,在俄国社会中,尤其是社会上层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数众多的俄国贵族、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包括沙皇家族成员加入俄国共济会。俄国共济会与近现代俄国政治、宫廷政变、社会革命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对俄国近现代政治变迁产生重要影响,构成了俄国近代以来一种新的非官方政治因素及政治变迁的驱动力。俄国共济会秉承“世界主义”、“自然神论”和“天下一家”的宗旨并且以秘密方式积极涉入俄国上层社会,干预俄国政治,因此它被看成是俄国社会和文化的异己力量,是败坏俄罗斯文化传统和威胁俄罗斯国家的破坏力量。沙皇政府时常对共济会采取禁毁态度,俄国社会也对其持否定态度。

谋论”。^① 从共时态来看,1940~1970 年代的东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是苏联对外政治和国内政治中的“敌人形象”更新、转换、变形的主要原因。

俄罗斯学者、预测学家利西奇金院士(В. А.Лисичкин)和谢列平(Л. АШелепин)在其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中将“冷战”同时视为“信息心理战”(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война),并将其上升到 20 世纪的第三次世界大战(треть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的高度,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本质主要在于使用了新武器——信息心理武器,亦即对人们攻心以及对社会意识施加影响的若干手段之应用。……使用它们不仅可以操纵个体意识,而且可以操纵整个民族的意识。”而且信息心理战“似乎是在人们的视野之外进行的,其真正的意义尚未被世人理解。”^②

“敌人形象”也是“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也即“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的重要手段。“文化外交”是冷战时期一种特殊的外交方式,是指苏美政府在对外关系中有意识地以本国的政治哲学、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等为主要文化内容,通过文化交流、信息传播、大众媒体、民意调查和支持非政府组织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公众,扩大本国政府、公民与国外公众的对话,减少他国公众对本国的错误观念,提高本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冷战期间,苏美两国政府将文化外交活动作为一种输出政治话语的隐性手段,赋予了大国文化战略为军事战略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和功能,政治文化冲突就成为这场长达 50 年之久的世界范围两大力量思想对抗的主要内容。

在苏美冷战和东西方对抗时期,双方都实施了极具目的性的政治宣传,其共同之处都是极力把对方塑造成违背人类本性、违抗社会发展规律、违逆上帝意愿或宏伟政治理想、为自己之私欲而牺牲他人利益的恶人——敌人。而在其背后则体现了双方极强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并在塑造过程中带入了—些非理性的色彩,融合了许多主观臆断和凭空捏造的思想。德国社会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冷战背景下敌人形象给出以下的论说,“在自由机制与集权机制竞争时,双方都尽量把敌人形象转变成一股

强大的内部力量,依靠它把社会变成一个堡垒。敌人总是存在,不仅在战争期间威胁着我们,在和平时期也同样存在,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变成了一个永远具有力量的体系。”^③

冷战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苏联行政和军事管理体制得以延续,为保障苏联公民的思想统一,这一体制有效地利用了“敌人形象”和“苏维埃爱国主义”。因此在苏联对外政治动员中包含了 5 个层次的内容:(1)冷战的背景;(2)心理战的实质;(3)信息的现实性、政治宣传和政治神话;(4)敌人形象;(5)苏维埃爱国主义。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苏联作家协会、《文学报》和善于在苏联公民煽动反犹太主义的东正教会在对外政治动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以“美国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国外敌人形象一直到 1980 年代初在苏联社会中都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外交的“新思维”转变,“美国人”、“美国文化”和“美国政治”才以“积极形象”(активный образ)进入苏联,并以与此之前的“敌人形象”极度逆反的形象和极其迅速的方式影响着苏联政治和苏联政治文化。

① “犹太人阴谋论”的说法早在 12 世纪就已出现,中世纪的欧洲的基督教教徒视犹太人为魔鬼,是阴谋颠覆基督教的敌基督。“犹太人阴谋论”是世界历史上各个时期和各国政府迫害犹太人的一个主要的理由。犹太民族在公元 14 世纪初出现俄国内,到 20 世纪初,世界上的犹太人约半数居住在俄罗斯帝国内,历代沙皇政府以及各级统治者对等犹太人始终是采取限制、压制和迫害的政策。1903 年,由民族主义者克鲁舍万(П. Крушев)主编的杂志《旗帜》(Знамя)(8 月 28 日至 9 月 7 日)发表了《犹太智者议定书》(Протоколы сион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的全文文本。1905 年 12 月 9 日,《犹太智者议定书》单行本在彼得堡出版。该文本围绕一个主题:犹太人如何控制非犹太民族,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如何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宗教领域制造混乱、蛊惑百姓、扰乱经济、发动战争,不择手段实现建立全球性的“犹太王国”的目的。《犹太智者议定书》已被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米留科夫(П. Милоко)、捷列夫斯基(Ю. Деревский)、斯瓦季科夫(С. Свизиков)证明纯属伪造,是沙皇政府警察局国外分部总监拉奇科夫斯基(П. И. Рачковский)指派人员伪造的。但仍为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东正教极端保守派和黑色百人团分子利用,成为俄罗斯 20 世纪初反犹运动乃至全世界有影响的犹太人阴谋论的理论基础,并且流毒甚广。

② 利西奇多等著,徐昌翰等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第 2,1 页。

③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Маркузе Г. Одномерный человек),莫斯科:和平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3 页。

收稿日期 2010—01—28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张建华,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

【责任编辑 池 豫】